

高寿仙◎著

智道

天地

智
天
地

【积阳为天 积阴为地】

孔子说：“子在川上曰：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”从流水潺潺的平常景象中，孔子体味出时事运转、无穷无尽的天地意识。在中国的文化精神传统中，天地观占有重要位置。天道是人道之本，天文为人文垂范。



中国
古代
智
道

中国社会出版社

国家一级出版社★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高寿仙◎著

天 智 道 地



中国社会出版社

国家一级出版社 ★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地智道 / 高寿仙著. -- 北京: 中国社会出版社, 2012.4

(中国古代智道丛书/王熹主编)

ISBN 978 - 7 - 5087 - 3986 - 1

I . ①天… II . ①高… III . ①自然哲学—哲学思想—研究—中国—古代

IV . ①N0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61207 号

天地智道

丛 书 名: 中国古代智道丛书

主 编: 王 熹

著 者: 高寿仙

责任编辑: 牟 洁

出版发行: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: 100032

通联方法: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

编辑部: (010) 66063028

发行部: (010) 66085300 (010) 66080300

(010) 66083600

邮购部: (010) 66061078

网 址: www. shcbs. com. cn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: 170mm × 235mm 1/16

印 张: 12.75

字 数: 160 千字

版 次: 2012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2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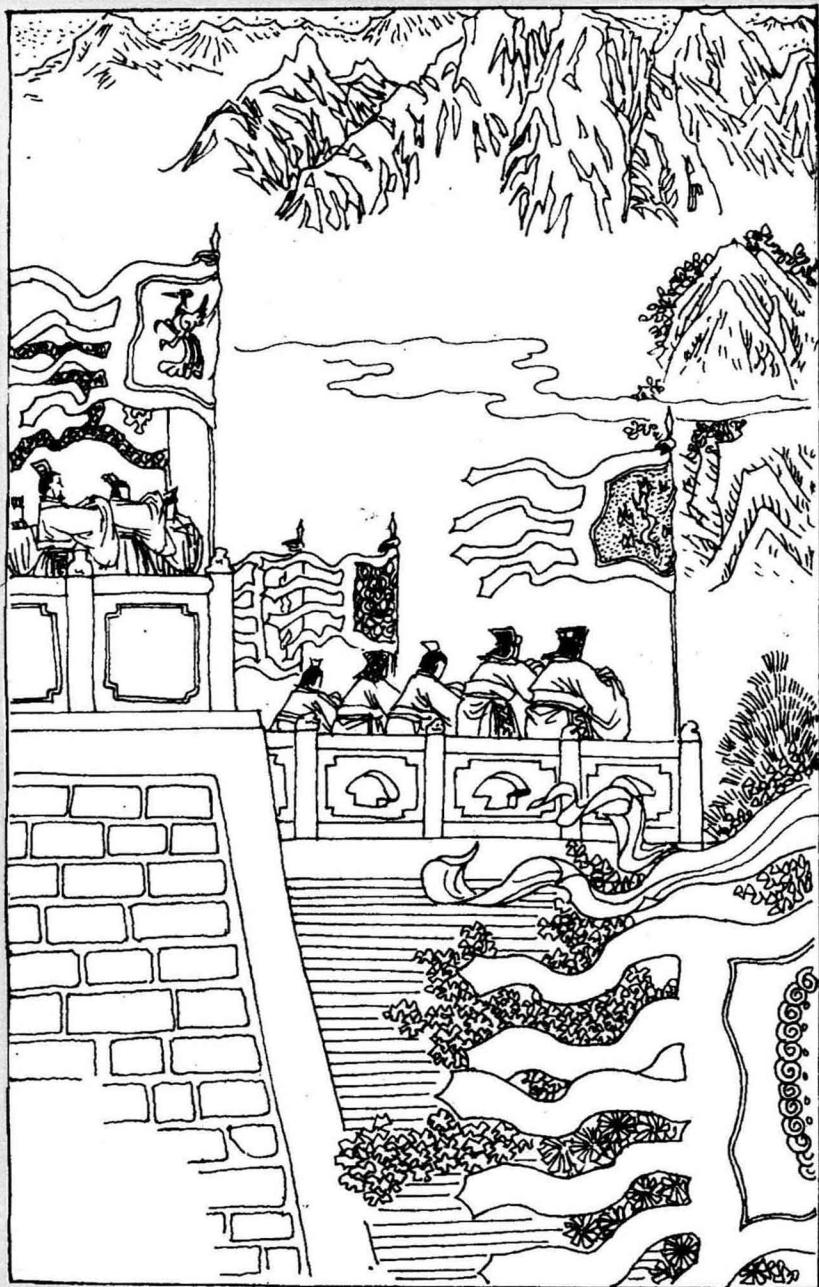
图一 周文王筑灵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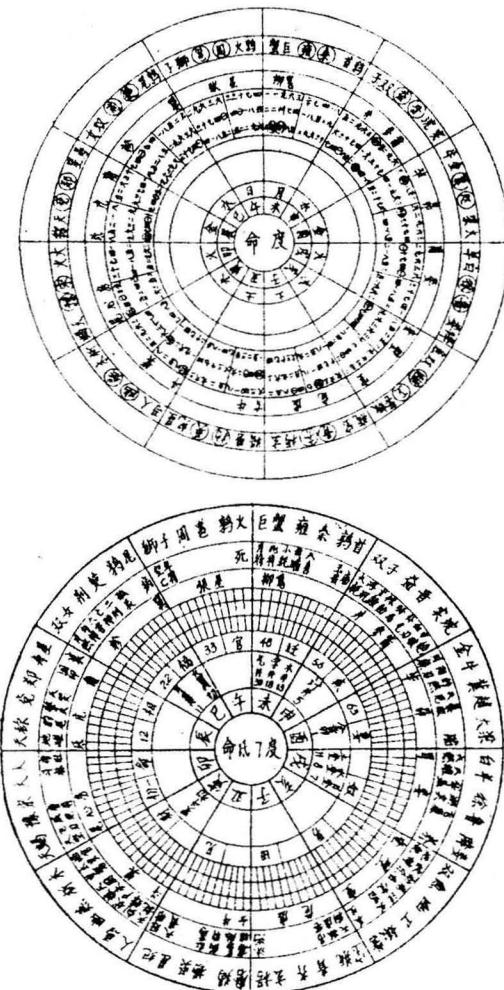
图二『天子无质，高远无极』——宣夜说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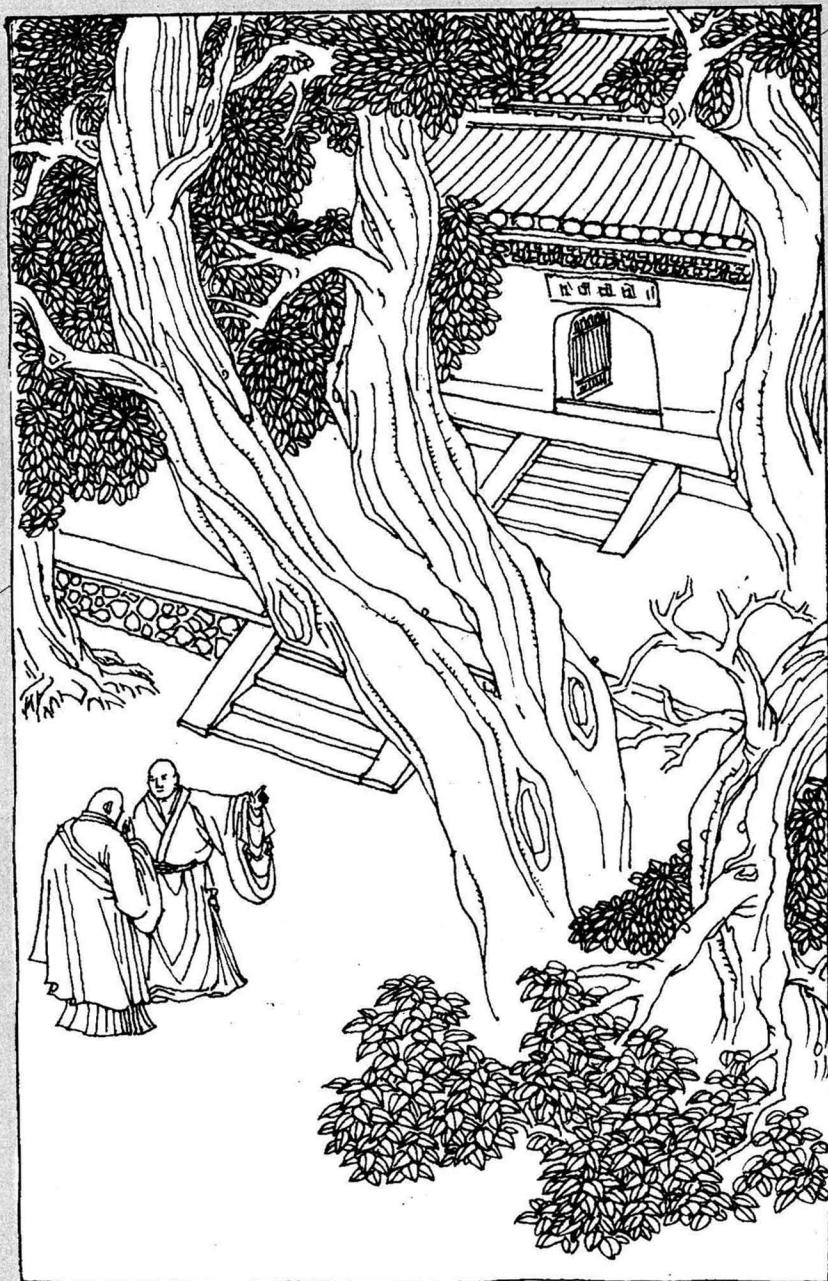
图二 汉武帝泰山封禅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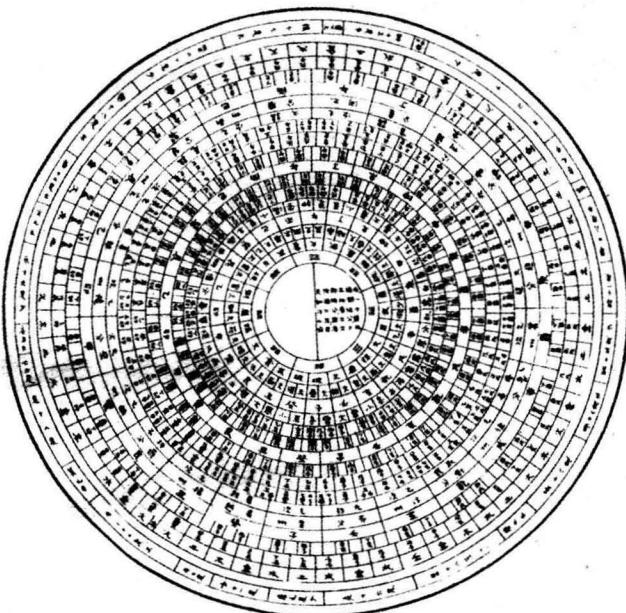
图四 星盘是星命家的工具



图五 僧人选寺址，多为山清水秀之地



图六 罗盘·发明于晚唐初期





总 序

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，是一个文献典籍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度，国人以此为荣耀和骄傲。我们的先人怀着对中国历史发展无比崇敬的热忱，特别注重对历史过程的探索，注重历史发展规律和经验教训的总结及借镜。他们以继承和发展、开拓与创新为重，以赴汤蹈火、前仆后继的大无畏民族精神，不顾身家安危，敢于向皇权和邪恶势力作斗争，直面千夫指，捍卫了历史的尊严与神圣，载述了历史发展的轨迹，极大地丰富了历史科学的内涵，进而使我们拥有了二十五史、地方志、实录、文集等林林总总、无与伦比的历史文化遗产，为我们继往开来、建设更加繁荣强盛的国家提供了科学依据。

历史是不能假设的，否则就是荒谬；现实是需要面对的，否则就是逃避，而沟通历史、现实与未来的桥梁，恰恰就是文化与智慧。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动力的源泉，使我们懂得伟大源自平凡，崇高源自执着，魅力源自孤独，成功源自独创，生存源自选择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将历史研究与认识国情、建设新中国紧密联系，赋予历史科学新的生命活力，使中国的史学研究和发展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辉煌时期，涌现出许许多多像范文澜、郭沫若、翦伯赞、白寿彝、蔡美彪等在海内外都享有盛名的历史学家，他们撰写的中国通史、断代史、专门史以及普及教育的历史著作，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专业史学工作者和历史爱好者，使中国的传统史学研究有了传人和继承者，这是祖宗的恩赐，更是老一代革命家的冀盼和厚望。正是在先辈的感召和谆谆教诲下，20世纪90年代的初期，一批专门从事中国历史研究颇有造诣的年轻史学工作者，因应广西教育出版社江淳女士、李人凡先生的要求，将各自在史学研究领域，钻研积累的个人心得认识贡献出来，由涓涓细流汇集为《中国古代智道丛书》系列出版，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，赢得了读者的赞赏。这说明历史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生产



力，它是推动历史、现实，更是推动未来向前发展的动力。

回首往事，斗换星移，当年的年轻学者如今有的是教授、研究员、博士生导师，有的是科研部门的骨干力量；往昔出版社的独具慧眼，使我们能够捷足先登，得以充分展露自己的才华睿智，获得社会和世人的认同，的确幸莫大焉。而今中国社会出版社重新出版我们的研究成果，致力于服务大众和弘扬祖国的历史文化，他们确实具有远见卓识，令人为之振奋。这是我们著者的机缘，也是读者的幸运，更有可能“走出去”，让世界人民了解我们中国古代灿烂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。《中国古代智道丛书》是从我泱泱中华文明之树上采撷的一批智慧之果，经由最耐得住寂寞的专家、学者的阐释、总结、提炼与升华，形成了一套关于天地、节令、官省、君臣、治国、人际、军事、用人、饮食、服饰的中国古代智道丛书。它们自成一体，各有侧重；互相映衬、珠联璧合。这套源自中国古代人民智慧的丛书，是迄今仍具活力的灿烂奇葩。它香溢神州，芳播四海。它是古代炎黄子孙的伟大创造，更是世界文化宝库的璀璨明珠。它为全人类所仰慕，理应为全人类所利用。

有感于此，是为序。

王 素

2012年5月于澳门理工学院成人教育及特别计划中心

目 录

第一讲 天地之运与自然之道 / 1	
虚幻与现实:中国古代的天地观 / 2	
域中有四大:“道大,天大,地大,人亦大” / 11	
应天地:领悟宇宙运道 / 19	
第二讲 宇宙之象与天人之观 / 22	
宇宙之象:天地的结构 / 23	
创世之说:天地的生成 / 29	
天人之观:天与人的关系 / 36	
第三讲 问天之术与应天之智 / 52	
敬天的宗教 / 52	
星象:对上天启示的索解与顺应 / 73	
第四讲 地灵之祭与风水之探 / 127	
对神灵大地的礼敬和崇拜 / 128	
风水:对大地灵气的探寻与应用 / 139	
结语 / 189	



第一讲

天地之运与自然之道



传统与现实之间，虽有差异矛盾，但更浑然相通。“子在川上曰：‘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’”孔子的确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，他从流水潺潺的平常景象中，体味出时事运转、无穷无尽的天地意识。天地之化，生生不已，日往则月来，寒往则暑易，往者过，来者续，无一息之停留，正如河水之流淌。传统也恰似一条河，它发源于远古，潺湲而下，汇纳百川，以成巨流，一直流向今天和明天。因此，所谓现代，本不外乎传统之演进，而传统，也绝不是博物馆里的死古董，除了供人研究、观赏外，毫无现实价值可言。可以说，我们无往不在传统之中。

中国古代的天地智道，内容宏丰，自成体系。所谓“智道”并不仅仅是现代意义上的“智慧”（Wisdom），而是指体现民族性格的心理结构，也就是一种文化精神传统。因此，它实质上是源于中国本土文明所衍生的、独具中国特色的一种文化，一种艺术，一种科学，一种智慧的结晶。不管愿意与否，这种文化精神传统仍在直接地或间接地影响着今天的人们，有时其影响力还相当强大。

在中国的文化精神传统中，天地观占有重要位置，当然其落脚点是在人，天道是为人道张本，天文是为人文垂范。《易·系辞传》云：“天地变化，圣人象之。”刘勰《文心雕龙·原道》云：“观天文以极变，观人文以成化，然后能经纬区宇，弥纶彝宪，发挥事业，彪炳辞义。”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天地之道的终极意义，也可看到天地之道的现实功用。

虚幻与现实：中国古代的天地观

中国
古代
智
道
从
书

天
地
智
道
从
书
积
阳
为
天
积
阴
为
地

在古代世界中，一个民族的天地观与其宗教信仰的形态是密切关联的。我们认为，中国宗教可以界定为“哲人—巫教型宗教”，这也就是说，中国宗教是处于冷静的哲理思考和荒唐的巫教信仰之间的形态，它内含着一种强大的张力：一方面是反对过分的迷狂和淫祀，试图把宗教信仰尽力纳入礼制的和理性的范围，另一方面则体现了原始宗教所具有的狂热性，对神的祭祀和崇拜毫无节制。从自力宗教与他力宗教的角度看，中国宗教的内在张力表现为，一方面是对内在超越的高度强调和自觉追求，另一方面是对神灵和偶像的绝对依赖。

与这种宗教信仰的特点相适应，中国传统的天地观也呈现出斑驳陆离的色彩，是多层次、多角度的。有些人否认天地具有神性，而另一些人则坚信天的神性。承认天的神性的人们的态度也有很强的张力，一方面把众多的天体气象和地理事物加以神化，相信它们的绝对威力，对之祈求膜拜，希望众神赐福消灾，扶危济困；另一方面，则又相信神的意志以人的意志为依归，希望通过自己的道德修养和行为品行影响神灵的态度和行动。当然，大多数人采取的是一种折中与中和的态度。

斑驳陆离的天地观念

大体说来，中国古代的天地观可以区分为三类，即自然的天地观、宗教的天地观和伦理的天地观。

所谓自然的天地观，就是将天地视为无生命、无感情的客观物体，认为日月星辰的运行，阴晴雨雪的交替，江河的流淌，山岳的耸峙，都有着自然的规律，与人类的道德品行没有任何关联。在中国思想史上，对这种观念进行较为系统阐述的最早的一位思想家是荀子，他提出“天行有常，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”，认为天就是列星、日月、四时、阴阳、风雨、万物等自然变化的现象，或者说天就是整个自然界，是一个有秩序、万物并陈而不杂乱的宇宙整体。“天有常道矣，地有常数矣”，自然界有着自己的运行规律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，“天不为人之

恶寒也，辍冬，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，辍广”。荀子认为，天与人事没有任何瓜葛纠结，也无法相互感应，自然界有时会出现一些怪异现象，有的较常见，如日食、月食等，也有的不常见，如星坠、木鸣等，这些都是自然界自身运动变化的结果，与人事活动没有关联，不值得害怕忧虑。当然，也应看到，荀子的天地自然观是不彻底的，他还说过“天生蒸民，有所以取之”，“皇天隆物，以示下民，或厚或薄，帝不均齐”，似乎仍然相信上天是有意志的，是人世间的主宰者。

荀子对天地的自然性的认识，被东汉时期的王充发扬光大。当时描述宇宙结构的盖天说、浑天说、宣夜说争鸣不已，盖天说、浑天说尽管描述的结构不同，但都认为天是固体的，宣夜说则认为天是气体的。王充从天文学的发展中吸取养料，充实自己关于天道自然的观点。王充认为，“寒暑有节，不为人变改也”，“日朝出而暮入，非求之也，天道自然”，日月运行，寒暑更替，都是自然而然的客观规律，不会因人的意志而改变。人事的吉凶祸福与政治上的衰乱也和天无关，比如日月食，是完全可以推算出来的，“在天之变，日月薄蚀，四十二月日一食，五至六月月亦一食。食有常数，不在政治。百变千灾，皆同一状，未必人君政教所致”。王充由日、月食推及一切灾异，认为各种灾异都有各自特定的原因，与政治无关。“人不能以行感天，天亦不随行而应人”，王充对当时盛行的天人感应、谶纬迷信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评。王充在继承荀子思想的同时，也作出了重大发展。荀子强调“明于天人之分”，认为天与人没有关联。但是，人的直观经验和科学知识的发展表明，天与动物、与人之间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。比如，天要下雨，蚂蚁先搬家，蚯蚓钻出土；天阴下雨，人的有些疾病也会发作等。一味强调天人相分，而不能对这些联系作出解释，是难以服人的。王充继承了董仲舒的看法，认为天施气，产生了人和万物，人和万物都是含着天气而生长的，同气相感，故可相应。不过，王充反对董仲舒所说的天人相互感应论，主张天体庞大，故可通过气而感动人，人体渺小，不能通过气而感动天，天之感动人是无意识的自然现象，并不具有其他意义。

围绕天是有意志的还是自然的，在唐宋思想界中展开一场辩论，参加辩论的韩愈、柳宗元和刘禹锡，都是当时颇负盛名的人物。这场辩论由韩愈挑起，他写信给柳宗元，认为人有痛苦疾寒，就会仰天而呼，说天不公道，其实天听到人的呼喊怨愤，对有功者必定给予重赏，对有罪者必定给予重罚。对于韩愈的这种观

点，柳宗元提出激烈批判，他认为天地是没有意志的，不是神秘的精神性事物，上而玄黄色的就是天，下而黄色的是地，天地虽然十分庞大，其实和瓜果草木等自然物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，同样都是物质性的东西。天地和万物的形成都是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结果，天地万物之间并不存在什么最高的主宰，一切都是“自动自休，自恃自流”，“自斗自竭，自崩自缺”的自然运转过程，有功的人是自己立的功，有祸的人是自己招的祸，与天地丝毫不相干。刘禹锡支持柳宗元的观点，对天是一种客观存在，进行了更详细的说明，并进一步提出天人交相胜的新观点。

总的来看，在中国古代，持自然的天地观的人并不多见，所以我们才可以挑选几个代表性的思想家来说明这种观念。而宗教的天地观就无法用几个思想家来说明了，它是中国古代占有绝对优势的天地意识，为大多数人所信奉，上至大思想家，下至村老农妇，自帝王以至于庶民，概莫能外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同是持宗教性的天地观的人们，其侧重点和层次也有不同。对于思想家来说，设定一个神秘的至上神有时是出于维持现世社会政治秩序的考虑，如墨家继承西周以来的宗教思想，认为天是人格化的、有意志的，是无所不在、具有无上权威、能左右人间事务、能代表人间正义公理的最高存在。但墨家如此推崇天，是为了建构自己的政治理想蓝图，因此墨家的天不是西方神学意义上的“上帝”，而是富有现实的人文主义精神意义上的最高主宰。再比如将天人感应论推向极致的董仲舒，曾明确指出自己建构这一理论的目的是“屈民而伸君，屈君而伸天”。所谓“屈民”，就是让老百姓相信君权神授，神圣不可侵犯，安于现世的社会秩序；所谓“屈君”，就是以天的权威限制帝王的行为，要君主们相信“天之生民，非为王也，而天立王以为民也，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，天予之，其恶足以贼害民者，天夺之”。防止君主过分放纵恣肆，导致天下动荡，生灵涂炭，国破家亡。

对于普通大众来说，天和地没有过于深奥的意义，在他们眼中，天和地都是充满无数神灵的所在。这种观念的起源很早，是原始巫教阶段的产物。世界上所有民族都经历过巫教阶段，但一些民族由原始巫教发展出了一神教，也有不少民族始终保持着多种崇拜，而且巫教的泛灵观念一直保存下来，因而有数不清的神灵，就是天神和地神究竟有多少也很难数得清。术数则是巫教的系统化和理论化，其观念与巫教也略微有了些差异。对于星象家来说，天体和气象现象是神秘

的，但其本身并不是神，而是神意所表达的吉凶展示；而在风水家眼里，山岳江河则是充满灵性的，但又是可以制约、可以利用的，只要找到了“真穴”，就能兴旺发达，而住宅和墓葬所处地方不利，则会有厄运来临，这种吉凶并不是由神直接决定的，而是由地理环境和方位造成的，通过人的选择和改造可以进行改变。

伦理的天地观就是把天地视为道德的本体。由于“神道设教”是中国一贯的传统，对天地的宗教性的看法和伦理性的看法常常是水乳交融的，伦理的天地以宗教的天地为基础，宗教的天地因具伦理意义而更加神圣崇高，伦理的天地因具宗教意义而更加牢不可破。凡是主张宗教性的天地观的人，基本上也都同时相信天地的伦理性，当一个遭受欺凌和痛苦的人呼天抢地，希望老天爷惩治暴虐之徒的时候，两种天地观在他心中是融为一体。上述墨子和董仲舒均用天来做自己政治理论大厦的基石，实际上也是把宗教的天与伦理的天熔为一炉。清代学者皮锡瑞在《经学通论·易经》中指出：“古之王者恐已不能无失德，又恐子孙不能无过举也，常假天变以示儆惕……后世君尊臣卑，儒臣不敢正言匡君，于是亦假天道进谏，以为仁义之说，人君之所厌闻，而祥异之占，人君之所敬畏。”这番话是就规范统治者而论，实际上这种思想对平民百姓也有很大的制约和潜在的警示作用。

天地观与时代精神

中国古代的天地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尽管其主调前后具有连续性和统一性，但循着历史发展的长河放眼望去，它在不同的时代又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，而且与整个时代精神是息息相通的。

周代以前，是宗教迷狂的时代，人们对于日月星辰、山岳河湖等自然物非常崇拜敬畏。在这种时候，还没有所谓“天地”意识，人们所孜孜追求的就是人神沟通。《礼含文嘉》云：“天子灵台，以考观天人之际。”当时人神沟通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，但对最高统治者来说，“灵台”却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，因而我们才看到这样一幕历史戏剧：当周文王积蓄力量，准备灭商的时候，征用了大量人力赶造了一座灵台，《诗·大雅·灵台》对此吟咏道：“经始灵台，经之营之。庶民攻之，不日成之。”灵台在汉代以来被作为天文观察台的代称，故郑玄注谓“天子有灵台者，所以观祲象、察氛祥也”，孔颖达流引公羊说谓“天子有灵台以